

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及其当代启示

肖宗志,王妮^①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的规模、程度和有效性成为人们判断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女性地位的特殊历史发展历程使女性公民参与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民主的内涵与本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发展成为民主进步的模范农村抗日根据地,这与边区妇女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妇女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不仅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建设,更为当代妇女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借鉴基础,现实意义深远。

[关键词] 妇女参与; 陕甘宁边区; 意义;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052-07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1]。妇女参与作为公民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一 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妇女参与的历史背景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男性与女性作为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因而女性也理应共同分享人类文明的硕果,而不应只是扮演附属品的“第二性”角色。女性与男性同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推动者,力量不容忽视。然而,所谓的“文明”社会却发展成为了女性为“奴”的起点^[2]。男人决定,女人服从^[3]。男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掌握了世界的权柄,而女性则作为“制度化”的他者,发展成为“第二性”^[4]。在男性统治者的严加控制与限制下,女性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已逐步隐退,被遗落在“人”的发展进程之外。全世界的女性都在遭遇着“第二性”的悲惨历史。有史以来,西方的文明社会也是概莫能外。而处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和百余年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中,女性的命运更为悲泣,她们是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经受过难以想象的创伤。

时代在发展在进步,历史在更新着前进,人类开始重新反思女性的地位与作用。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在“人权”思想的提倡与冲击下,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时隔漫长的远古史,终于得到了承认。正如狄德罗所言,“女人和男人一样属于共同的人类”,这样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启蒙运动发现妇女!^[5]在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法国女性首先揭竿而起,举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翻开了女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西方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感染着世界各国的女性,唤醒了她们的权利意识。她们从卑微顺从,对自身定位“集体无意识”的境遇中走出,开始走上了妇女解放的征途^[2]。在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也进行得热火朝天。从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发出“解放妇女”、“废缠足,兴女学”的呐喊时起,经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参政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的追求妇女独立人格,再到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声势浩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裹挟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同时进行。妇女参与是顺应历史发展与时代召唤的选择,更是保障女性权利的途径,尤其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力量。关于妇女参与

[收稿日期] 2015-10-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资助(编号:2014HNJD)

[作者简介] 肖宗志(1964-),男,湖南常德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① 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社会活动,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⁵⁹抗日战争时期,贫困落后的陕甘宁边区能够作为中共领导下民主的、进步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妇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解放,大体实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所规定的目标^[7]。广大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积极主动地抗敌御辱,为支持抗战和实现妇女参与做了一切她们能做的事情。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女性同胞积极参与边区公共生活,为边区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7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提出:“一方面要立即改造与扩大乡妇女代表会组织,并充实他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乡以上新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它是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8]1938年3月,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并宣布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边区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妇女组织。同时,边区作为农村根据地,妇女工作主要在农村展开。1939年,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认为“目前抗战,需要广大农村妇女有组织的帮助,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这样就给了动员农村妇女以必要的前提和有利的时机,使中国妇女运动大踏步地深入到有最广大妇女群众的农村去。”^[9]边区的妇女运动始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指导。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必须把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实利益作为日常工作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女性同胞响应中共与边区政府的号召,在法规条例的保障下,积极参与边区建设。

一方面,边区妇女参与是支持抗战的坚强力量。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扩大,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困境之中,抗日战争转变为一场全民抗战,任务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肩上。广大妇女同胞作为一股重要的抗战力量也必须投身于抗战的汪洋大海。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0]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决定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根据战争特点,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方针政策,加强根据地建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各方力量进行整合。陕甘宁边区

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抗日战争的重要指挥中心,发动全体民众,尤其是妇女群众抗日更是刻不容缓。抗战开始以来,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抗战方向,中国逐步进入了以农村为主要抗战基地的局面,农村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但是抗战前夕的陕甘宁妇女大多都是足不出户的典型农妇,处于传统的封建伦理秩序下,蒙昧无知,再加上陕甘宁边区远离抗战前线,她们难以切身感受到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伤害。为了组织和发动她们,中共和边区政府及时采取新的决定,利用一切力量动员边区女性积极参与边区建设。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儿女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广大妇女的境遇最为悲惨。边区妇女在政府的宣传鼓励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下,边区妇女积极组织了慰劳队、洗衣队、缝衣队、救护队等,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抗战,到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中,妇女已经成为后方生产的最主要力量。广大妇女在边区努力工作,为前线抗战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布匹以及军需物资,极大地改善了军需供应,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物资保障。另外,为了保证抗战部队的兵员充足,边区女性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动员、支持自己的亲人走上前线,有力地保障了抗战部队的不懈兵源。

另一方面,边区妇女参与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说:“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到三种有系统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1]在《寻乌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12]可见,中国女性长期以来地位低下,受压迫最深,生活悲苦。所以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政府的号召下,边区女性通过参与边区的各项公共事务,整体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逐步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权利意识,敢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维权。如: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反缠足规定,并且懂得不缠足是基本的人身权利。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也开始懂得婚姻自由,逐步掌握了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权利意识的觉醒表明了妇女参与使得妇女解放这一伟大事业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从

婚姻和家庭中走出来的边区女性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加边区建设。在中华边区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下,妇女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许多妇女还当选为县乡一级的参议员,行使了自己的政治权利。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与对象是陕甘宁公共生活,参与的目的在于推动边区发展,最终在推动抗战胜利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自我价值。通过妇女参与,边区妇女的素质得到了逐步提高,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同时也有不少女性还尝试改造身边的家人朋友。女孩三能说:“照顾得了自己,还能给大家办事,这辈子小米才不白吃!”^[13]边区女性在政府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在边区干部的热切鼓励下,“敢于担当”的权利意识萌发,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满足了衣食住行用,更提高了自身素质,从而实现了妇女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民主参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女性解放作为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尺度,一直为东西方文明国家所追求。马克思说过:“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4]即人是社会中的人,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存在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只有在思维中才被允许的抽象^[15];“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成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6]。虽然历史上出现过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也主导过社会发展,但历史的变迁,男性社会开始,历史舞台已经容不下女人,她们退守家庭生活,以群体性消失于社会舞台。正如恩格斯所言:“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7]中国女性同样面对如此的命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女性同胞所遭受的压迫作过形象概述,指出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座大山”的压迫,处境悲惨。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家庭主妇,“三从四德”一直被奉为圭臬,成为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警戒线。女性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备受压迫与奴役。因此,无论东西方国家,“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中解放,争取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成为女性运动的主要任务,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二 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民众从旧政权下得到解放,为妇女参与提供了政治条件。如何将更多民众,尤其是妇女

民众引导进入民主政治生活,将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是边区民主政权的关键任务之一。

一般认为,所谓政治参与就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工作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活动^[18]。由于妇女参与概念的提出借鉴了政治参与的内容,体现的是女性通过一定的途径参与公共生活,具体是指女性通过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处理问题,在公共生活中自由地表达看法与意见,并且公正公平地影响政府行为与公共生活,即公共活动的制定、实施、评价与反馈。换言之,妇女参与指公共生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运行过程当中融入女性视角和女性活动的行为。参与的实质是妇女解放,作为“半边天”的女性构建女性意识、表达女性话语,分享组织权力等行为,突出女性的代表性与自主性^[19]。

首先,妇女政治参与。这一时期的边区妇女通过积极主动参与政治会议,大胆表达,争取实现自身利益,试图寻求支持抗战与实现女性权利的平衡点,切实影响了边区社会治理的各项政策。抗日民主政权赋予了边区女性政治权利。从家庭中走出的乡村妇女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与选举,行使这一神圣职权。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女性参政议政权利的实现,在每次乡选中都动员,并且创造条件使具备选举资格的妇女参加这一政治生活。很多乡村女性通过当选为县乡参议员,行使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提出的《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鼓励妇女参政,规定:“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在1941年边区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中,有167名妇女当选为县级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级参议会议员^[20]。参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妇女。妇女不仅愈加积极主动地参加了选举活动,而且在选民大会上敢于“议政”,大胆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与批评。如庆阳市第六乡的选民大会妇女占半数多,妇女提了很多意见,其中就包括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反对男人打骂女人、反对婆婆苛待媳妇、反对男人吸烟赌博^[21]。这些以往足不出户,只知生儿育女、侍老奉夫、料理家务的乡村女性,现在主动在参议会上同男子一起议事,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边区妇女地位提高的典型表现。陕甘宁边区逐步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典范,不仅保证了一定比例的女议员参政,而且还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干部参加工作。这些干部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卓越的领导能力,她们治理有方、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如安塞县的女县长邵清华就是一位深得

民心的好干部。她关心群众利益,工作细致,深受群众爱戴。年仅24岁的她,将安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通商贸易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解放日报》介绍:“邵清华到任后,处理了几个案件,在市镇上向群众讲了一两次话,不久就名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妇女干部是妇女群众的先锋与旗帜,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与主动精神。

其次是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在边区,大批青壮年男子或上抗日前线,或被征调(如运盐、修路等),妇女就成为边区农副业生产的重要力量^[7]。在抗战困难期,乡村妇女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发挥了边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作用,参与范围极其广泛——从七八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妇孺均参与到生产运动之中,盛况空前。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强调指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广大妇女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目的,亦须从经济充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22]基于这种认识,边区在动员妇女参政议政的同时,还积极动员妇女参加边区经济建设,使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边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与热情,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如以马杏儿、郭凤英为代表的农业劳动英雄,以黑玉祥、刘桂英、张芝兰为代表的纺织英雄,以刘金英为代表的抗属劳动英雄,以陈敏、柳辉明为代表的部队家属劳动英雄,以李凤莲为代表的工业劳动英雄等,边区选出的妇女“劳动英雄”有300多名^[23]。这些妇女劳动英雄不仅是各个劳动战线的佼佼者,而且是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组织者。妇女参与边区经济建设,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提高了妇女在家庭、社会和政治上的地位,意义重大。

再者是妇女参与文化与动员。抗战前期,边区文化落后,文盲率达到了99%^[24],妇女几乎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社会意识与民族意识更加无从谈起。针对严峻的教育形势,边区妇女在政府的号召下,积极参与文化活动。边区妇女参与了冬学,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也经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抗日救国意识,民族意识更加强烈;针对边区教

育落后,妇女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的现状,边区开展妇女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鼓励妇女接受文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在中央号召下,许多妇女在农闲时间或利用晚间就在冬学、夜校、半日校和识字组里接受文化教育。依据1939年的不完整统计,边区有冬学619所,学员10317人,女学员1470人,占14.2%;夜校581组,学员7935人,女学员418人,占5.3%;半日校186所,学员3026人,女学员2340人,占77.3%;识字组5513组,学员39650人,妇女10053人,占25.4%^[25]。可见,边区妇女教育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妇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识字的同时,民族意识、爱国意识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同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所有的妇女群体都把宣传抗日、动员参军,唤起民众觉醒作为首要任务。何香凝、史良等女界领袖在《告妇女书》中号召:“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站起来。我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邓颖超也在《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中号召广大妇女都来参加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边区,广大妇女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朋友参军,往往一个妇女就能动员四、五个壮丁上前线。据相关统计,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一共动员了三万多人参军作战。在落后的边区,参军人数如此众多,这与边区妇女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模范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毛泽东所言:“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26]

最后是妇女参与改造社会风气。抗战初期,边区社会失序的现象处处可见,如二流子问题,毒品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缠足问题,社会风气亟待净化。边区为此制定了很多规定条例,以妇女为例,就曾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切实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规定、条例的制定保证了政策在边区的执行^[27]。社会生活方面,边区妇女积极参与禁除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缠足陋习运动,参与净化社会风气的禁毒运动等,对改造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面对边区的封建迷信活动,缠足陋习,二流子以及鸦片问题,妇女都积极参与改造之中。尤其对于本是深受其害的缠足陋习,许多地区对此却有根深蒂固的特殊情结。起初,在落后的陕甘宁边区,缠足禁令作用很小,许多边区妇女仍然是三寸金莲。边区妇女根据法令规定,自发成立

了以县为组织单位的各级妇联放足突击委员会,深入到各乡、各户宣传妇女放足的益处与方法。由于蔡畅、红军女战士和妇救会的宣传,“很多妇女都欢迎,主动地放了足。”^[28]许多已经放足的妇女也主动加入不缠足运动,并且结合亲身体会,宣传放足的好处。通过妇女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与配合,这场规模宏大的群众性反缠足运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放足运动,那些放了足的妇女,上山、赶集都很方便,使“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29]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加入放足行列,逐渐改变了落后的社会习气,妇女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抗日战争时期,妇女除了参与反缠足运动外,还参与了反对封建迷信活动,改造二流子以及禁烟运动等,正是由于女性的广泛参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与边区政府的领导与动员下,广大妇女群体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以极大的热情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在历经战争的洗礼后,中国的妇女向世界人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也获得了诸多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向“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三 社会治理理论视域下陕甘宁边区妇女参与的当代启示

关于妇女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论述:“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6]59}由此可见,妇女的社会地位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女性通过参与边区社会事务,提升了自身地位,对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的,都是在特殊历史阶段中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都具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规律,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寻得自己存在的根据^[30]。但相关部门仍然可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法令,更好地为当今中国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实现多元主体治理地方事务服务。

治理理念作为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更是党领导下社会各项事务能够有条不紊进行的一剂强心针。治理理论的主体强调多元,即除了政府之外,还包含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再者,治理的性质上,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了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治

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最后,治理所及的范围以公共领域为边界,范围宽广^[31]。合理的社会治理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更加需要稳定并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社会各个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建构起相对稳定良好的新局面。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由于处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要实现社会稳定,进而为抗战胜利提供基本保障,其社会治理模式必须要具有多元主体的社会参与特点,以实现战争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这就要求基层社会的一切力量都被充分调动和组织起来,从而为抗战的胜利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妇女参与陕甘宁边区各项事务正好为这一基础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通过积极融入边区建设,实现了广大妇女群体的联合,不仅成为了支撑边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更提供了抗战胜利的坚实保障,尤其对当今妇女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借鉴意义。

第一,妇女参与的实现必须以法制为保障。抗战时期,中共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妇女运动,先后制定与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制度,涉及到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边区妇女参与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法规制度的规范下,边区的女性得以真正参与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治理。

第二,妇女参与的实现必须运用综合手段。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妇女参与看作一个系统工程,运用综合手段进行治理。除了制定法规制度外,还辅之以生产劳动、广泛宣传、文化教育以及军事惩处等手段,以达成政治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统一,开启边区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篇章。

第三,妇女参与的实现必须要兼顾人民群众的利益。边区妇女运动的展开,主要是为解放妇女的同时,输入更多抗战力量。换言之,妇女参与是以人权实现与民族大义为根本目标的。因此,边区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考虑当时实际情况,兼顾民众实际承受能力”。正是因为这种亲民意识,所以妇女运动才得以在边区顺利展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妇女参与地方治理的情况却还不乐观,存在不同形式的权利虚置、信息缺失、组织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是影响妇女参与地方治理的不利因素,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社会组织配合来完善。当今,我国妇女参与社会治理过多地游离于权利的边缘地带,只有极少数女性进入权力中心,因

而出现了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虚置。相关部门应当在通过各种方法提升女性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同时,给她们更多的机会进入权力中心。正如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妇女参与社会治理,党和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制度层面为妇女参与提供坚实保障一样。针对信息缺失的现状,政府的推动与主导作用仍然不容忽视。互联网时代,地方治理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建设信息网络。具体而言,有关部门要运用综合手段,培养和发展信息网络的人力资源,整合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信息资源,拓宽信息服务的途径,充分利用通信基础设施,优化信息服务模式,建立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保证信息网络的长久生命力。同时,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应当重视信息网络人才的培养,注重培养女性网络信息工作者,以获取源头信息,避免信息失真而造成实质上的信息缺失。关于妇女组织问题,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组织力量缺失,不仅仅要解决能力问题,也要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尤其要强化组织的网络化建设,为妇女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专业化保证,使女性成员间及其与男性成员间实现信息交换,资源共享,加强女性及其组织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保障妇女参与权利,同时更要引导组织的利益趋向,让妇女参与在结合自身的切身利益,满足女性群体利益的同时,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与涉及边区建设的各个方面,我们仅从边区妇女参与选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中共和边区政府正是实践了社会治理的方法论要求,通过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占有“半边天”地位的女性力量,军民互动,同仇敌忾,才不仅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成了模范边区,为抗战时期的边区建设提供了范本,更为当今妇女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 新华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3-11-16)[2015-09-18]. 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 [2] 刘晓辉. 当代中国女性发展探析[D]. 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M]. 刘晖,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85.
- [4] [美]贝尔·胡克斯.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 晓征,平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9.
- [5] 阎冬潮. 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6.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恩列斯论妇女[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7] 黄正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J]. 抗日战争研究,2004(2):75-99.
- [8]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内部资料)[Z].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3:46-47.
- [9] 陕西省妇女联合会.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Z]. 西安:陕西省妇女联合会,1982:5.
- [10] 毛泽东.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N]. 新中华报,1939-07-25.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 [12] 毛泽东.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7-178.
- [13] 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83.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3.
- [15] 袁贵仁. 对人的哲学理解[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387.
-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5. 515.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18] 孙景珊.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研究[J]. 社科纵横,2014(29):123-128.
- [19] 付怡君. 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妇女参与研究[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20] 黄正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J]. 陇东学院学报,2003(1):57-67.
- [21] 逸平. 胜利的收获——陇东(1942年)乡市选举通讯[N]. 解放日报,1942-10-20,1942-10-21.
-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Z].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185-186.
- [23]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Z]. 陕甘宁三省区妇联,1987:80.
- [24]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下)[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66.
- [25] 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N]. 中国妇女,1939-02-16.
- [26]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Z].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49.
- [27] 雷小倩,杜方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J]. 江西社会科学,2012(2):142-146.
- [28] 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3:65.

[29] 白 茜.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
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90:450-469.

[30] 段文斌.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
前沿专题[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8.

[31] 张小劲,于晓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36.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a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n the Shans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XIAO Zong-zhi, WANG N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its scale, degree as well as effective-ness has become one core index of democratic and modernized level of the nation. Moreover, because of spe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emale status, female citizen participation has more profoundly embodied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modern democrac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hans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has developed into a model of democratic rural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border regions. The specific work of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Shans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order region, but also set a good example to the contemporary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ffairs, 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woman’s participation; Shans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significance; enlightenment